

ZHONGGUO GUDAI MUKE HUA SHI LUE

ZHENG ZHENDUO BIANZHU

郑振铎
编著

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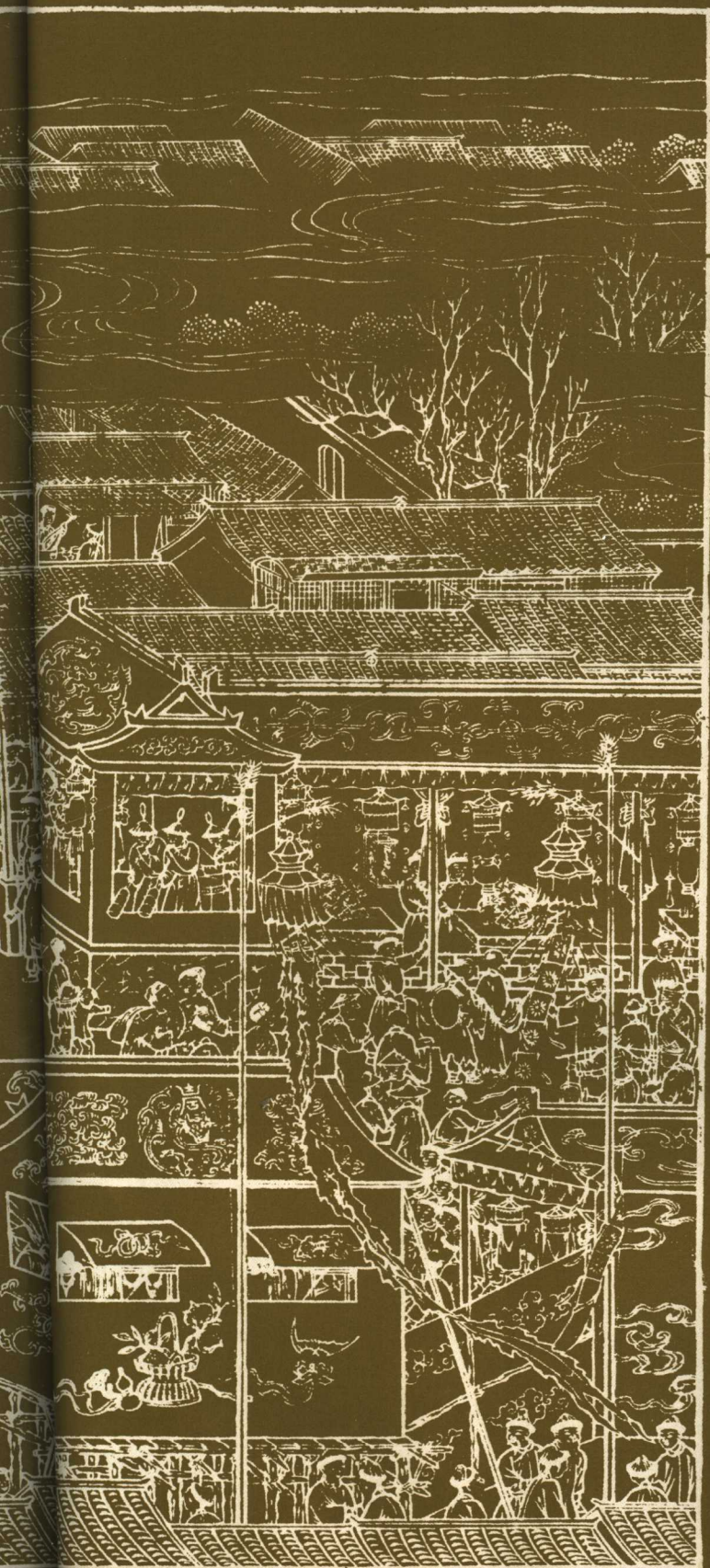


上海书店出版社

郑振铎 编著

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郑振铎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1
ISBN 7-80678-179-X

I. 中... II. 郑... III. 版画—绘画史—中国—古代
IV. J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7539 号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阙 政
封面设计 范峤青
版式设计 峤青工作室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丁 多

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

郑振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75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78-179-X/J·99

定价 35.00 元

本书中文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郑振铎先生的最后一部奇书

唯大时代乃产生大著作

陈福康

《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是郑振铎西谛先生呕心沥血撰写的一生中最后一部开拓性的学术专著。这部书在西谛先生为国牺牲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首次以单行本形式正式出版，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西谛先生哲嗣郑尔康老师和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金良年兄，让我在书前写一篇导读文章，我深感这是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惶恐的是自己对中国木刻画（版画）史缺少研究。不过我一直研究西谛先生，熟悉他以毕生精力搜集、保护、编印、研究中国木刻版画的动人事迹，探讨过他多年反复构思、几度因故搁置、然而锲而不舍、最后百忙中卒底于成的艰辛经历，还知道此书原稿在他身后长期湮佚而终于复现的曲折故事，以及书稿发表后在国内外美术界、学术界、出版界所引起的巨大轰动等等。我想，我主要就来写写这些“掌故”，当能对读者有所帮助（记得当年鲁迅先生给西谛先生的信中，夸奖西谛为他俩合作编印的《北平笺谱》作的序写得好，就说是“内函掌故不少”）。读者如果了解了此书凝聚着的那么多生动、丰富的“掌故”，更不用说此书本身博大精深、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就一定会觉得它是一部真正的奇书！

这部书，代表着西谛的一生爱好，也寄托着鲁迅的殷切

期望。

事情得从头说起。西谛少年时代，就因喜读旧小说，从而爱看小说书前的“绣像”。1920年代初，他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便留意于刻本之插图。有一天，他在旧书店看到了有“全图”的《笠翁十种曲》、《浣沙记》、《红梅记》、《焚香记》等书，不禁怦然心动，然因书价高而犹豫再三，最后终于咬咬牙买下。这些便成了他的版画宝库的奠基品。后来便越收越多。当时，他不知道鲁迅也对木刻画深有兴趣，只是孤独地做着这无人顾及的工作。

1924年起，他撰著的《文学大纲》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发表，其中国文学部分附印了很多古代版画，颇受读者欢迎。1925年4月，他写信向鲁迅请教小说史方面的问题，鲁迅回信并寄赠了明刊插图的《西湖二集》六本。西谛为之狂喜。鲁迅逝世后，西谛写的《永在的温情》回忆文中便写到此事；在他的这部《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的注释中，又不忘写上了一笔。当时，商务印书馆同事周越然也开始买带版画的古书了，他们便常常交换着鉴赏，视界因以渐广。未久，吴梅先生编印《奢摩他室曲丛》时，以所藏明版曲书移度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西谛因此一时获睹很多带版画的珍籍，眼界更为之大开。他撰写一篇长文《插图之话》，发表于1927年1月《小说月报》上，文中附印了不少版画。这不仅是我国近代研究中外书籍插图的最早的论文，而且文中也最早论述了中国木刻画的历史。

从这时起，他就暗暗立志，要为中国版画编一选集，并进而修一专史。自此他对版画书有见必收，而且还专门带了摄影师，到周越然、吴梅等人家中遍阅所藏版画书，并摄影。他的这一浓烈的爱好和当时已成国内第一的版画收藏，开始在文艺界广为人知。1931年6月9日，鲁迅便由冯雪峰、蒋径三陪同，并带日本青年增田涉，兴致勃勃地“往西谛寓，看明清版插画”。

这是鲁迅日记中所记第一次上他家作客。27日，西谛又托同事蒋径三带给鲁迅一盒印有彩色版画的信笺及一盒信封。7月23日，他又寄赠鲁迅一部《百华诗笺谱》，鲁迅即

复信道谢。这部笺谱是1911年天津文美斋木刻彩色套印的（其实从鲁迅“书帐”中可知，早在1912年4月29日鲁迅就已购买过了）。

这时，西谛还认识了几位热爱版画的朋友。其中就有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赵万里，和在北平各大学任教的马廉。1931年8月，赵万里来上海访书，西谛便同他一起去宁波访问回乡度假的马廉。在宁波，他们拜访了不少藏书家，也见到了不少版画书。一天，马廉拿出了一本抄本《歙中绣刻图画名手录》，所记乃是明代徽派木刻家的姓氏、谱系，并说：此录创自陈大镫；北平通县王孝慈得之，作了增补；马廉从王孝慈处抄来，又作了增补。西谛一看，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因为他虽然注意于版画的刻工，但因缺乏史料，不曾作系统的研究。而且，他发现马廉以前到他家看书时所见的几个刻工姓氏，均已补入其中了。他为马廉的勤奋与细心而佩服。他和赵万里便连夜各自抄录了一份。后来他又作了若干增补。那几天夜里，他们睡在马廉老家的西厢房，老屋屋顶作半穹形，他觉得很像明代版画中的样子，便笑着说：“我们成了王伯良校注《西厢记》的版画中人物了！”

这次宁波之行，西谛终生难忘。他后来在《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序》中还提到当时抄写的那本姓氏录，提到陈大镫、王孝慈、马廉等人，并说：“这当是中国木刻画史的‘椎轮’，我当时曾传抄一部，也补充了若干则，便是这部《史略》的初步基础。我应该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敬意和谢意，他们一生酷嗜古代的木刻画，搜集了不少资料，虽不曾留下什么著作，其创始之功是应该加以记录的。”

宁波回来后不久，西谛离开上海到北平工作。北平市里有一个最古老的名刹法源寺，其佛像最晚的已是明代前期所塑。这些塑像背后都有一个方孔，当初塑造时或后来重修时，曾把经卷、历本等文书投入方孔，以祈福佑，或记年月。人称这为“佛脏”。“九一八”事变后，寺僧生活困难，便开始掏佛脏中的经卷等，偷出去卖钱。一旦被识货的书商发现，便互相勾结，大量盗卖散失。而越掏越深，越在底下的文书，年代越久，价值越高。正在这关键时刻，被西谛知道了，赶紧不惜代价抢救保存。他购得古刻本佛、道书二百多种，其时

代从宋元到明嘉靖都有。最令他欣喜的是，其中多有木刻画，正好填补明代嘉靖以前中国版画史的一段空白。从此他更认真地考虑要编一部反映中国版画历史全貌的大书了。

可是，连西谛自己也没想到，他最先编印的版画，却是时代最近的笺谱。那是鲁迅提议的。而鲁迅的建议却又是因为西谛的赠书引起的。1933年2月3日，鲁迅收到西谛的新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前三册，对书中印入版画插图十分欣赏，加上以前西谛曾赠送过笺谱，终于引发鲁迅向他提出一个考虑多时的计划。5日，鲁迅写信致谢，并正式提出一个建议：“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留黎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和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但此事恐不久也将消沉了。因思倘有人自备佳纸，向各纸铺对于各派择优各印数十至一百幅，纸为书叶形，彩色亦须更加浓厚，上加序目，订成一书，或先约同人，或成后售之好事，实不独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耳。”鲁迅殷切地询问：“不知先生有意于此否？”鲁迅提到的《文美斋笺谱》，正是一年半前西谛赠送的《百华诗笺谱》。

鲁迅的建议，句句说在西谛的心坎上。后来，1934年1月，终于诞生了一部鲁迅、西谛合编的《北平笺谱》。当时二位先生反复商量研究，历尽曲折和辛苦，甚至遭周作人之流的嘲讽，其中故事亦复不少。由于此书知者较多，这里就不详写了。鲁迅高度肯定西谛的苦干精神，并认为这是“草创”的工作。鲁迅在《北平笺谱序》中说：“此虽短书，所识者小，而一时一地，绘画刻缕盛衰之事，颇寓于中；纵非中国木刻史之丰碑，庶几小品艺术之旧苑；亦将为后之览古者所偶涉欤。”鲁迅在提议信和这篇序中，多次提到“中国木刻史”，是意味极为深长的。

在《北平笺谱》刚刚印好的时候，西谛又向鲁迅提议重刻《十竹斋笺谱》。该笺谱是明末刻印的，正值中国古代木刻艺术最鼎盛时期；又由于明清之际大乱，经过三百年，此书已极为罕见。西谛多年访求，当时仅知有三部。一为天津陶湘所藏，待他写信去问，则已卖给日本某书店；等他再去信日本，对方却推说已卖出。又一部为上海狄楚青所藏，则秘不示人。还有一部即北平通县王孝慈所藏，西谛通过赵万里

把它借来，即请荣宝斋翻刻重印。

西谛雄心勃勃，还想不止复活这一部版画书，而且要进一步编印成系列的《版画丛刊》。这点更获鲁迅赞许，称为“尤为佳事”。后来《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印成，封面即标明为《版画丛刊》之一。鲁迅并从实际出发，建议有的古版画可以不采用费时费钱的复刻，而用珂罗版石印。这一条西谛当时就采纳了。鲁迅逝世后，西谛二十多年编印版画，也是这样做的。在复刻《十竹斋笺谱》的同时，西谛又请珂罗版印刷厂试印了若干版画样张，并寄给鲁迅看，鲁迅认为“印刷甚好”，同时指出：“有图无说，非专心版本者莫名其妙，详细之解说，万不可缺也。”这实际上正可看作是鲁迅殷切希望西谛撰写一部“万不可缺”的中国版画史。

重印《十竹斋笺谱》与《北平笺谱》有两点不同。一是此次乃由西谛提议，鲁迅赞助；二是不只是重印，而首先得重刻，不仅费用高得多，而且刻印的店铺仅荣宝斋一家，所以进度很慢。第二册付刻后，工未及半，日军侵略，燕云变色。不久，他又被迫辞去在北平的教职，又困于资金，复刻工作几至中辍。第二册未完工，鲁迅已不幸逝世。未久，王孝慈也逝世。又未久，抗日战争爆发，这一工作便停顿。该书最后一册复刻印成，要一直到1941年11月（列入西谛主编的《中国版画史图录》中），才合为完璧。

二

鲁迅逝世翌年，故都沦陷，上海成为“孤岛”，硝烟翻滚，复刻古代版画之事当然无从提起，即使珂罗版摄照石印的工作也进行不下去了。但是，鲁迅的遗愿和嘱托，保卫文化遗产的责任，西谛一刻也没有忘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上。

第一，他在上海，在日寇劫火中，继续拼一己之力，尽量抢救、保全有关古代木刻史料。

明代遗民陈老莲、萧尺木两家绘《离骚图》，他早就有了罗振常复印本，甚至还曾不惜高价买过萧氏绘初印本（残缺），并以武进陶氏摹本配齐。但当他在“孤岛”上海见到因

战火而流散出的萧氏《离骚图》初印全本时，虽在朝不保夕的景况下，仍毅然购之。他在《劫中得书记》中写道：“访求近十五年始得其全，一书之难得盖如此，诚非彼有力之徒，得之轻易，而惟资饰架者所能知其甘苦也。”

一次，西谛听说一位他不认识的张尧伦先生近收得一部萧尺木绘《太平山水图画》（此书他在十多年前就曾在旧书店见过，可惜当时已被日本人买走），于是便托人向张先生求借。借来后，见木刻“图凡四十三幅，无一幅不具深远之趣。或萧疏如云林，或谨严如小李将军；如繁花怒放，大道骋骑；或浪卷云舒，烟霭渺渺；或田园历历如毡纹，山峰耸叠似岛屿；或作危岩惊险之势，或写乡野恬静之态。大抵诸家山水画作风，无不毕于斯，可谓集大成之作已！”（《劫中得书记》）他拍案惊奇，赞叹不已，又力恳张尧伦允许他摄照翻印。张尧伦有感于他这般“痴情”，慨然同意用他收藏的几部太平天国方面的书作为交换。他大喜过望，在《劫中得书记》中写道：“于是此‘版画’绝作，遂归于余。十载相思，得遂初愿，喜慰何已！而尧伦割爱相赠之情，亦‘衷心藏之无日忘之’也！”

他当时不顾一切地买了很多书，如明版徐光启《农政全书》、杨尔曾《海内奇观》、金忠《瑞世良英》等等，除了因为这些书本身内容的价值外，也是与它们的木刻画有关的。这些木刻画，他后来都写进了《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还将它们选入《中国版画史图录》等书中。像《太平山水图画》，他当时还专门写了文章，又因其几乎幅幅皆精，不忍舍去一幅，竟全收于《中国版画史图录》。

最可一提的是，在那样不幸的艰苦的年头，由于西谛先生精诚所至，竟然奇迹般地得到了他一生版画收藏中最大的收获——一年内获得中国木刻画史上两部“伟著”！他在《劫中得书续记》中说：“余收集版画书二十年，于梦寐中所不能忘者惟彩色本程君房《墨苑》、胡曰从《十竹斋笺谱》及初印本《十竹斋画谱》等三伟著耳。”《程氏墨苑》，明万历彩印本，原藏天津陶湘处，为海内孤本。当年鲁迅就一直感叹未能见过。西谛曾携张元济老先生亲笔介绍信前往天津，才得以目睹，并抄下目录。他当时再三叮嘱陶湘：“此书决不可

卖！”抗战爆发，陶湘避居沪上，生活困难，靠鬻书以活。西谛也因生活所迫，刚将自己一批戏曲藏书让归国家图书馆，囊有余金，便急向陶湘买下此书。他在《劫中得书记》中说：“此‘国宝’也！”“书至之日，灿灿有光，矜贵之极。曾集同好数人展玩至夕。”他在《劫中得书续记》中又说：“十载相思，一旦如愿以酬，喜慰之至，至于数夕不能安寝。”

《十竹斋笺谱》，前已说过，西谛曾向北平王孝慈借来翻刻。刻成第一卷后，鲁迅与王孝慈相继亡故，西谛继续与王氏后人相商续借续刻。可是王家此时极窘迫，不能不售书以谋葬事。这部笺谱后来卖给了北平图书馆。当时西谛还曾托北平友人表示欲买下，其实也不过是说说而已，因为当时他根本没有这笔钱。所幸此书终归国库，北图负责人是西谛的朋友，慨允借用。但他从未奢望过自己能收得此书。不料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有书贾竟从淮城一带购得一部，特地送到他家里，于是他倾囊购之，并在《劫中得书续记》中悲喜交加地写道：“生平书运之佳，殆无逾于此二年者。虽困于危城劫火之中，亦不禁为一展颜也。”他还写道：“一灯如豆，万籁俱寂，深夜披卷，快慰无极！复逐页持以与余翻刻本对读，于翻刻本之摹拟入神处，亦复自感此番翻刻之功不为浪掷也。”这种激动、自豪的心情，一般人又如何能体会到呢！

至于初印本《十竹斋画谱》，西谛也有收藏。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这些“国宝”，在西谛牺牲后，都已按照他生前意愿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而且，今知西谛所捐《程氏墨苑》共有四部，《十竹斋笺谱》共有三部，《十竹斋画谱》共有四部（另还有清刊本一部）之多！可知西谛后来仍有见必收。他的这种爱护国宝的精神是何等感人啊！

第二，在上海“孤岛”后期最紧张、艰苦的时候，西谛开始撰写《中国版画史》，并编印出版多卷《中国版画史图录》。

据当年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回忆，1939年夏，西谛约他去家里商谈有关出版《中国版画史》的事。原来，自与鲁迅合作计划编印《版画丛刊》以来，西谛一直在默默地断断续续地做这方面的工作，有关木刻图他也已投资印好不少。现在，他打算把这部精心设计、计划共二十四卷

的巨著，交给良友公司在二三年内出版。其中四卷为《中国版画史》，二十卷为图录。西谛曾经给过良友公司巨大帮助，而且他这次自己承担印刷装订等费用，加上他反复强调了此书的价值，良友便答应给予合作。

1940年1月号《良友画报》上，西谛发表了《谭中国的版画》长文，并附木刻二十余幅，作为对读者的首次声明。文末说“我二十几年来，专意搜集我国版画，所得附插版画之图籍在三千种以上。所见所得单幅之年画亦不下二千幅。有见必收，有闻必录，在各公私图书馆及各收藏家所摄得之版画影片亦盈数篋。近发愤聚集所得之材料，编为《中国版画史》四册，《中国版画史图录》二十册，交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经售，或足一雪世人忽视我国版画之耻罢。”

西谛还为良友公司用中英文编了一本《中国版画史样本》，印出供预购者参考。据样本介绍，西谛计划分写唐宋元版画史、明初版画史、徽派版画史、近代版画史等，共约三十万字，编成四册，作为这部巨书的正文。“正文部分，考释源流，钩稽史实，创写传记，评鹭图型，在在皆第一次见之文字者。积稿数尺，用力甚劬。”他还谦虚地说：“或有未谛，恕其草创。”样本还载西谛1940年1月7日所作《中国版画史自序》，用精炼的语句概述了整个中国古代木刻画史，并说：“世事瞬息万变，及今不为纂辑，则并二十余年来所见搜集者或将荡为轻烟，虽百身何赎乎？因悍然不顾其疏漏，先就所已得者，次第刊印行世，或有以际斯沧海横流，狐兔群行村落中，救死不遑，匡时为急，而乃荒时废业以务此不急无补之作见讥者。余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书生报国，毛锥同于戈戟。民族精神之寄托，唯在文化艺术之发扬。历劫不磨，文事精进，乃可卜民族前途之伟大光荣。”他提到了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意大利的但丁、德国的歌德和席勒，还有中国的司马迁和章太炎，说明他们的著作“胥写于辛劳忧勤之中”。“唯大时代乃产生大著作。我民族光荣之建设，正息息在牺牲与奋斗中迈进。余之兹书，或亦不贤识小之所贡于我民族者乎？”这些话，把撰著这部书的伟大意义阐述得透彻无比。

图录前几辑，由于早已印好，经装订成帙，编成四卷

(册),就装入丝织锦缎套函,发售给预约者。原计划每隔四月出一辑(函),估计两年就出齐,包括文字部分的一函四册。但当时西谛精力所限,只能先忙于编印图录,加上“孤岛”形势所迫,实在无法关起门来专心写史;而且,几乎在他刚向读者声明写版画史的同时,1940年1月19日,他又与张咏霓、何柏丞、张元济等先生秘密成立了一个“文献保存同志会”,开始为国家在战火中大规模抢救珍本古籍。这是更加迫在眉睫、更加重要的工作,西谛为之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心血。因此,《中国版画史》在“孤岛”时期也就一直没能写成。而图录部分,从1940年5月至1941年12月8日上海“孤岛”沦陷、良友遭日军查封为止,共陆续出版了四函十六册。直到抗战胜利后,西谛又请上海出版公司印行了四册一函,总算把图录部分作个结束,以不愧对预订者。真是用心良苦!但是那部西谛打了无数腹稿,而且数次开笔又辍笔的《中国版画史》,却未能问世,以至后来很多人都只知道有一部《中国版画史图录》了。

尽管如此,皇皇二十巨册,共收图千余幅的《中国版画史图录》的出版,也是圆了当年西谛与鲁迅计划编印《版画丛刊》的夙愿,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1947年出版的蓝海的《中国抗战文艺史》说得好:“在孤岛的上海,那里有特殊的政治环境,给那里的文艺战士们以特殊的任务:和汉奸们肉搏,在敌伪的压制、恫吓下奋斗。在那里,《鲁迅全集》和郑振铎编的《中国版画史(图录)》的出版,不能不说是抗战期间文艺界的大事。”(按,《鲁迅全集》的出版,西谛也是出了大力的。)

这里还想提到的是,在上海完全沦陷于日寇铁蹄下的近四年间,西谛被迫离家变名隐居时,仍把最心爱的一批版画书从家中转移出来,带在身边。可知他这时还是想把这部《中国版画史》写出来的。到1944年,为了全家人活命,他被迫一次次忍痛出卖自己的藏书以换米,他后来在《求书目录》中写道:“虽然把旧藏的明刊本书,清刊的文集以及四部丛刊等书,卖得干干净净,然而所最喜爱的许多版画书、词曲、小说、书目,都还没有卖了去,正想再要卖出一批版画书而在恋恋不舍的时候,天亮的时间却已经到了。如果再晚二三个

月‘天亮’的话，我的版画书却是非卖出不可的。”可见，西谛宝藏这批国内外第一的版画书，是多么不易啊！

三

抗战胜利后，西谛立即投身于民主运动现实斗争的第一线，自然无暇于木刻画史的撰著。1947年起，他又花巨大精力编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以及《韞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等巨型图籍。这些书也都有着不得不出理由，耗费了他无法估量的心血，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至今令人惊叹的成绩。日月如梭，历史进入新中国时代，西谛担任了国家文化部门的领导工作。但在繁忙公务之余，他还撰写、编印了《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等书。上述《历史图谱》和《艺术图录》中也用了有关木刻画，在其说明文字中也涉及版画史。

1952年9月6日，西谛致上海出版公司刘哲民信中提到：“又在写《中国古代版画》一文，写好后，也当寄上。如果不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出，则当交‘公司’印出也。”不是投寄给报刊发表，而是要在出版社“印出”，可见篇幅不小。这应该是西谛再一次启动撰写中国古代版画史了。不过他太忙了，这次又没有写完。后来，在1956年写的《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序》中他说：“我便于一九五二年里，费了五个多月的时间，从《中国版画史图录》里，选出了有代表性的作品三百多幅，又加上补充的木刻画二百多幅，编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因为关于‘史’的部分，迟迟未能写成，所以一直搁置到现在。”

1956年春，他去陕西、河南等地视察有关文物、古迹和图书馆等。4月5日到上海视察，工作十分紧张，然而从7日起，他还抽空到静安寺旁“庙弄”他的老家整理自己的藏书及笔记，主要目的就是搜寻撰写版画史的材料。4月10日，他又去浙江视察，23日回沪后又时常回老家理书，他的日记中常有“理书，弄得双手乌黑，甚累”这样的记载。劳动节那天，他理书时疲劳之极，后来在浴缸里洗澡时竟然睡着了。而

5月19日的日记载：上午“八时许，到庙弄。整理抽屉，忽觅得徽派刻工姓氏录一小册，大喜不禁！此录已觅之数年未见，因之，版画选未能出版。现既得之，就可入手写‘史略’了。”这里提到的，就是1931年8月他在宁波马廉家抄录的《歙中绣刻图画名手录》。10日日记又载：上午“八时许，到庙弄。在乱纸堆里和抽屉里，发现了不少关于版画史的材料和稿子，很高兴。”可见，在那以前，西谛确实已经写过不少草稿。

西谛在外奔波视察了两个月，直到5月中旬才回到北京。由于找到了以前搜集的有关材料及初稿等，这次他便下决心要把久蓄于心的版画史写出来。8月，他很难得地有了一个避暑休养的机会（这些年，他的痔疾非常严重，经常大出血，领导上也劝他休息）。6日，他至青岛，初住文登路甲6号，后住黄海路。但他并没有真正的休息。25日，他致刘哲民的信中说：“青岛风景甚好，我所住的地方，窗外即是大海，终日夜可听到涛声，小园里满是松树，清幽之至。故在这里倒能够写出不少东西来。《版画史》的‘史’居然也在此二十天之内写成了。近二十年未能完成之作，居然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之！其为愉快，更何如也！”今后的中国版画史研究者，应该感谢并瞻仰青岛这个地方啊！

10月29日，西谛致刘哲民信中说：“《版画史》已交给人民美术出版社印了。”当时，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萨空了先生，正是西谛的女婿。然而，这里说的可能还只是版画史的图的部分吧。因为1957年1月2日，西谛日记中又写到他上午“将《版画史》的注释加以补充”，晚上也“整理《版画史》注”。1月5日，日记又载：“连日在整理《版画史》。即将付印。一上了手，就觉得有不少问题，处处得查书、找书，花的力气还要不少！”这里又写“即将付印”，实际又没有成为事实。直到8月31日，我们在西谛日记中又见到：上午“八时，到（文化）部办公。整理《版画选集》的稿子。接电话，说要提早一天，即三号走，弄得手忙足乱。”西谛是把版画史作为版画选集的一册来编的，因此他这里说的整理稿子可能还是指版画史。他在9月3日离京赴保加利亚参加中保文化协议签订五周年的纪念活动，然

后赴捷克斯洛伐克讲学，然后再赴苏联讲学，一直要到12月2日才回北京。而9月1日西谛日记载：上午“整理《古版画选》稿”；“下午，继续整理《版画选》稿”；夜，“继续整理稿件”。9月2日，上午仍是“理稿”，直到晚上，才“将《中国古代版画选》整理好。午夜十二时，空了来，即交给他。”（着重点为本文作者所加）而翌日清晨七点十分，飞机就起飞了！看看这些日记，西谛先生是如此忘我地、认真地工作啊！他为这部书，倾注了多少心血啊！9月11日，他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还给人民美术出版社领导写来信，谆谆关照：“这类书，本身就是艺术品，在造纸、印刷方面，都必须事前考虑周到，甚至必须试印若干次再做决定。印刷单色的，最好用珂罗版。如有问题及印样，请于九月三十日以前，寄保加利亚索非亚大使馆转，在十月二十日以前，寄捷克普（布）拉格大使馆转。”（按，人民美术出版社后来在该书《出版说明》中引用此信，误为1958年所作。）又见他对此书是何等的重视！然而遗憾的是，这部书又一次搁浅未印！

这到底是为什么？详情至今扑朔迷离。据说与当时“反右”后的政治形势有关。又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批斗该出版社的“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时，还把这部书稿作为“大毒草”拿出来示众，并将其烧毁了！

然而，神奇的是，冥冥中竟如有神护！就像西谛先生崇敬的南宋爱国诗人郑思肖在其《心史》的自跋中说的那样：“此书虽曰纸也，当如虚空焉，天地鬼神不能违，云雾不能翳，风不能动，水不能湿，火不能燃，金不能割，土不能塞，木不能蔽，万万无能坏之者！”“四人帮”打倒后，日月重光。先是在1980年，在萨空了先生家清理以前被“造反派”查封的书房时，在一个书柜的底下发现了《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的后半部（七至十二章）；1983年1月，又在萨空了家的汽车间的垃圾堆里，再次神奇地发现了《史略》的前半部（一至六章）及《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的画稿。据郑尔康相告，这部《史略》是他人的抄稿（如此看来，很可能不是西谛先生的定稿，而手稿确已被毁掉了），而版画部分则是印制成的大小统一的样张（看来确实曾经“付印”过）。而这些当时劫难之中怎么保藏下来的，由于年代已久，连萨空了等人都记

不得了。不管怎么说，这总是极其值得庆幸的一件事！于是，西谛家属重将此稿交给人民美术出版社。该社同志悲喜交集，极为重视，并曾在《版画世界》上先行选刊。

1985年2月，《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终于由人美社正式出版，共一大函九大册，其中第九册即《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此书问世后，立即引起轰动。日本日中艺术研究会便在东京的中国文化学院召开两次学术会进行热烈研讨，并决定特派该会事务局长三山陵女士到北京向出版社赠授“版画史出版功劳”金杯奖。授杯仪式于1985年9月17日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中外众多贵宾出席，中央级新闻媒体均予以报道。日本该研究会仍感意犹未尽，1988年冬，他们再次在北京友谊宾馆，再向已故著者西谛先生（由郑尔康代表）敬赠金牌一枚。1986年，此书在莱比锡举办的世界最佳图书博览会上，被授予“世界最美图书奖”。

西谛先生一腔心血，终于没有白费！中华民族一部奇书，得以永垂不朽！

由上所述，可知西谛这最后的专著，是可歌可泣的时代产生的一部可歌可泣的奇书。是他苦心经营三十年，反复构想梳理，如数家珍，厚积薄发之原创性专史。字数虽不多，却是一部大著作。是鲁迅生前期望而未能看到的书，也是西谛耗尽心血而本人也未能看到出版的书。西谛先生确实是这部专史的最合适的著者，甚至我认为只有他才能写出如此一部空前绝后的大著。说它“绝后”，不是后人在学术上不能超越它，而是指像西谛那样以三四十年心血和功夫广泛搜集版画史料，并能以如此丰富的个人藏书为基础和依据来撰写这样一部史，在今后恐怕再也没有可能了。

鲁迅大力倡导中国现代木刻运动，他对国外木刻的介绍，对木刻青年的具体指导等等，为西谛所不及；但西谛也曾为苏联木刻画集等写过序，也曾支持和指导过全国青年木刻画展等。鲁迅对中国古代木刻也十分重视，做过很多搜集、编印、研究工作；而西谛在这方面显然贡献更多。前面已写过鲁迅、西谛亲密合作编印两部笺谱，成为艺坛佳话，广为流传；而鲁迅晚年最后编印德国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时，

西谛也出过大力，则不甚为人所知了。如果说，鲁迅先生是公认的中国现代木刻之父；那么，我认为西谛先生可以并列尊之为“亚父”。鲁迅偏重于理论指导，西谛则偏重于历史总结。西谛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这部《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就是最好的证明。

最后要写到的，这部书在1985年2月人民美术出版社版《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中以“第九册”的形式问世后（一共仅印320套），1988年9月被收入文物出版社版《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1998年11月又被收入花山文艺出版社版《郑振铎全集》。不过后面两次收入时，均删去了原书中的注释。而这是很不妥当的。一是这些注释极有学术价值，是著者的心血所注，也是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这些注释的字数也不少，几乎接近于正文字数。还须提到，人美社的责任编辑，是内行的版画研究家，曾对注释作了不少增补和修订，付出了辛勤劳动，这次我们对此基本予以保留（只是在个别字句上因体例统一等原因略有修改），特此说明，并致感谢。另外，我们纠正了人美社版的一些错别字和不妥切的标点。在书后，我们还附录了西谛先生几篇有关版画史的重要论文。我们还尝试将有关版画作为插图印在书中。如有不妥，敬请读者赐正。

写于2004年国庆节长假